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

吴晓明

当前,我们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这项任务是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抵达特定转折点时被提出来的:当实践的转折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体系也将面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样的转折从学术形式上来讲,是要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所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些中国色彩、中国元素或中国内容的学术,而是意味着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亦即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只有这样的学术或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一

中国自近代以来,便面临着大规模的现代化任务,因而也必然要求它在各个方面展开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在特定的阶段上获得了绝对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开辟出“世界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中,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因此,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任务的实际展开,中国在学术上也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去了。正是这样的历史性态势,使得中国的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要的、必然的,而且是积极的、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学术在今天的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能够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一般来说,经历学徒状态从而进到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近代以前的哲学曾经长期处在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神学的婢女”)。换句话说,先前的哲学并不具有它的自主基础,而是依附于理性神学的。只是从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开始,哲学才开始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并

作者简介: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笛卡尔的命题意味着哲学从思想(理性的思想)来获得它自身的真正基础,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一个从头做起的英雄,他使哲学真正立足于思想自身,而不再依赖于宗教信仰和外在权威。同样,历史科学也曾长期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近代的历史科学曾长期模仿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科学才开始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而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科学。

甚至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往往是经历学徒状态并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获得自我主张的。一个学生进入到长期的学校学习,就是进入到通常所说的学徒状态;但是一个老师的真正愿望,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对于老师来讲,甚至希望他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从而在学术上取得自主的成就。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绝不能说学徒状态是单纯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经历了学徒状态,经历了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立足点,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根基稳固的自我主张。但是,我们同样也会说,一个好的学生不会长久地或始终处于学徒状态中,而是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达到真正的成熟状态,也就是说,能够获得他的自我主张。

二

虽说学徒状态是必要的,是收获巨大且意义深远的,但是,学徒状态也有某种缺陷——它往往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往往易于采取哲学上所谓“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简单来说,那就是从老师那里学来了一些原则或原理,但却并不去研究特定对象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将这样的原则或原理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因此,所谓外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我们都很熟悉,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人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教条主义者。他们并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回来,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将马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更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因此,他们往往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当作抽象的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把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设想为“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外在反思或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样,黑格尔在讲到外在反思的时候说,虽然拿破仑是

位罕见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但当他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时，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外在反思或教条主义的实质乃是主观主义。它把从某处得来的理论或经验当作抽象的普遍性，并把它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对象、各种内容上去。黑格尔就此指出：一个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了。黑格尔因此把外在反思叫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同样，恩格斯晚年曾说，唯物史观现在有很多朋友，但这些朋友是拿着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他们只是把这样的原则或原理当作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而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们，马克思早就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滞留在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之中，甚至比起当年的教条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时的教条来自俄国，今天的教条主要来自西方。但是，无论这样的教条（抽象普遍性）来自何方，它都意味着外在反思，意味着实质上的主观主义。如果说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往往易于采取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那么，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学而无思”。如果从外面学来的东西没有被真正消化，那就只能是无头脑地用抽象普遍性来进行外在反思。孔夫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知识、学问，“思”就是思考、思想。如果只有学而没有思，那就叫“罔”，就是犯糊涂、没头脑；但同样地，“思”也需要通过“学”来滋生涵养，以便使二者成为彼此支撑和相互补充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思想乃是当务之急；因为重要的事情恰恰在于，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尤其是要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摆脱出来；而这只有通过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才能实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面临着开启思想的重大任务，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

三

但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决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学术上的自我主张也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和任意武断。对于我们来说，对外学习是重要的而且是长期的，就像我们的现代化任务是重要且长期的一样。这意味着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我们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因为只有通过文化结合的锻炼，自我主张才能成为容受性的，而对外学习才能成为自主性的。黑格尔在讲到古

代希腊的时候曾经说，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当时更加强大和优势的东方文化；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种情形，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希腊人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终于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意味着希腊人最终获得了他们的自我主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主张，才开创出古希腊伟大文化的鼎盛时期。

对于中国来说，外部思想的大规模进入并不是第一次，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梁启超先生在讲到佛教的传入时曾说，中国一方面从外部学来了佛教的教义、思想和方法，但是最终佛教是被中国化了。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大乘而不是小乘，对于中国影响深远的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宗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是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则使之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因此，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一方面是容受性，另一方面是自主性。没有容受性，就不可能从外部习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没有自主性，学来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纯粹外在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结合的锻炼不仅意味着对外学习的扩大，尤其意味着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自主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决不意味着排斥对外学习，而是要使这种学习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和有头脑的。

四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个任务的提出是需要一定的实践前提的——它是以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为基础的。只有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时，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才成为真正现实的。这样的实践转折点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就是自觉地意识到我们的现代化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承认现代化的普遍性，但尤其强调这种普遍性只有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得到具体化，才可能是真正现实的。黑格尔早就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虽然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乃是普遍的历史性任务，但是除非它能够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得以具体化，否则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展开和实现。例如，当一些俄国的革命家向马克思请教

俄国道路的时候,马克思的回答是: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试图采取英国式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1843年,马克思在讲到德国道路的时候甚至说,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

这意味着,普遍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普遍者必须能够摆脱它的抽象性而进入到根据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之中(从抽象到具体);没有这样的具体化,就没有真正的普遍性。例如,中国历史性实践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特定的阶段上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但是,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同样只有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即中国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展开和实现。

随着历史性实践的发展,我们愈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的任务,必须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从而使我们的现代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亦即“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样的实践进程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并因而形成了我们在学术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因此,这一任务并不是主观地臆想出来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召唤出来的。对于我们来说,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形式方面而言,它是“讲中国语的”。黑格尔曾经高度评价沃尔夫,因为他第一次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成为德国人的真正教师。就内容方面而言,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能够把握并切中社会现实,必须能够摆脱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必须能够深入到特定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中去(尤其是能够真正应答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经验)。

从这样的要求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但是随着实践转折点的到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时代任务。伴随着历史性实践的转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改变。之所以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那是因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社会科学乃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之所以说这种转变的发生“或早或迟”,那是因为它还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回应时代的呼声,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去推动和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成熟;而这种成熟的确切标志,就是实际地开展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构建。

构建与社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

翟锦程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具有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知识体系的演进都毫无例外地印证了这一点。知识体系与社会文明形态之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and 绝对的变化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文明形态的运动变化必然要引发知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而社会文明形态的相对稳定将会进一步巩固知识体系的存在形态和价值取向。基于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来谈一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

在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早期,由于各种文明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交流互通渠道,各种知识体系处于相对平行、独立发展的状态。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古代三大文明,它们分别有着各自完整的知识体系,古希腊有“七科”和亚里士多德知识分类构成的知识体系,印度有“五明”(即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知识体系,中国则有以“六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这三大文明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并形成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形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存在不同民族文化或地域性文化的根本原因。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不同形态的文明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知识体系的稳定性

我们以中西知识体系的发展为例来说明知识体系的稳定性。

首先来看西方知识体系的稳定性。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以修辞学、文法、论辩术,即“三艺”传授知识,构成了智者学派开展教育的内容,其价值取向是培养人发展的基本技艺。柏拉图提倡以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即“四科”实施教育,这“四科”则更加侧重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养成。“三艺”与“四科”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西方古代知识体系的框架雏形,也初步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 and 创制的三类。这些知识分类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构成了西方传统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得到了不断完善。

中世纪,奥古斯丁主张把《圣经》作为基督教教育的核心,他提出要学习算术、

作者简介:翟锦程,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项目基金: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核心概念与理论体系研究”(20CZGX19)阶段性成果。

几何、天文、音乐和文法、辩证法、修辞来理解《圣经》。“七艺”的神学取向取代了人的取向而开始显现出来。

随着欧洲早期大学的建立,大学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建设日臻完善,西方知识体系的发展也进入了完善阶段。1088年,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建立,它的教师团队开始对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内容不断进行了充实、改进与完善。1534年,耶稣会成立,经过多次改进而最终成型的《耶稣会官方教育计划》(简称《教育计划》, *Ratio Studiorum*)于1599年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定型。耶稣会的使命是布道传教,推广教育。按照《教育计划》的标准,耶稣会规范了教育体系的构架,在世界各地开设各类学校,并进行统一管理,使得西方知识体系在世界各地得到有效和广泛传播,并成为现代世界知识体系的基础,占据着主流地位。

西方古代知识体系相对稳定性的表现在于它适应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的需要,而神学的发展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总体上来看,中世纪的知识体系适应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这一社会形态发展需要。

我们再看中国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是周代官学教育体系的“六艺”。《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有:“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个体系的价值取向是以礼为核心,既规范了周王朝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也规范了人的日常行为的基本伦理。春秋时期,周王权式微,而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私学盛行,百家之学大行其道。其中以儒、墨两家影响最大,被称为“显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新“六经”传授知识,墨家以有百科全书之称的《墨经》为教本而“俱诵《墨经》”(《庄子·天下》)。至汉代,知识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以图书分类的方式呈现出来。刘歆编有《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辑略》为全书的概要,其余六略共有38种知识类型,涵盖了当时的全部知识领域。魏晋时期“四部”分类法开始萌芽,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命名各类图书,形成了涵盖55大类分类的知识体系。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居于正统地位。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同时,兴学养士,设五经博士、开设太学等,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自此,儒家学派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宋明时期,儒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而成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影响。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一社会形态发展需要。

二、知识体系的变化性

知识体系的变化性，也就是知识体系因社会文明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演进表现出来的变化。

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变化性。与古代知识体系相比而言，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在框架上尽管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在内容上发生了质的飞跃。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5世纪，伴随着全新的自然观的出现，把人看作高于自然的世界的中心，推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是不同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实验科学，在科学方法方面，催生了基于科学实验的科学归纳法，从而改变古代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形态，使近代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呈现出作为实验科学的突出特征，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快速发展与分化。19世纪下半叶以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推动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社会科学的出现，形成了对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社会科学，西方知识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并得到广泛应用，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欧洲步入工业社会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社会时代的来临，对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各个分支领域的内容越来越成熟与完善，似乎基于西方知识体系的现代知识体系，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各个分支，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并且不可替代的知识体系，占据绝对的话语权。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需要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化性。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转型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是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的转型，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推动了欧洲进入工业社会阶段，必然要引发知识体系形态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被推广到世界各地。二是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大面积的传播，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第二次传播，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西方知识体系还没有来得及被完全消化吸收就直接取代了悠久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产生了直接影响。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教育，从制度层面对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为构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铺平了道路。二是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从文字载体上取代了文言文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承载功能，也动摇了传统知识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这些都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形态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知识体系的变化上来，中国古代知识体系被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拆解到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中形成了中国近代的知识体系。尽管在其中不乏诸如中国哲学、中国语法学这样的“中国的”知识分支，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固有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被“外力”割裂开来而成为与西方知识体系对应的近代新学，这样的知识体系也与传统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之间出现“断层”，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则是全盘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我们之所以说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化具有颠覆性，是因为在这样的变化性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不仅失去了其独立性，而且也失去了自主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因。

三、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当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相适应，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初步建立起了现代知识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建设亟需人才，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再度进入到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阶段，其间吸收借鉴了大量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从国家层面先后实行了若干个计划，为中国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现实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中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提炼升华，从思想上形成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知道，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具备全球和全人类视野的价值观念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人类早期的知识体系，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希腊、印度和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

其价值观念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或地域性。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则与传统知识体系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时代背景。人类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共同问题,如气候、能源、人口、粮食、和平与发展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国、一个民族所能完成,而是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视野和全球性价值的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文明形态发展的新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在理论上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全新成果。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立足中国的,也是面向世界的。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有面向世界开放的视野。从历史来看,外来知识体系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其中以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播最为广泛,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比较优势。从现实来看,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世界发展产生了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力。因此,这样的知识体系既是自主的,也是开放的。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理论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实践上也没有现成的道路,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在理论上探索。因此,这样的知识体系构建,既不能回归到传统,也不能延续近代西化的方式,而是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历史重任。